

从清华园到联合国

杨晓雅（计73）



杨晓雅，河南禹州市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学学士（1992）、硕士（1994），曾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网络和信息安全处处长，现任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局标准化全会项目部主任，是联合国高级专业官员。

斗转星移，转眼已本科毕业20年。年逾不惑的我，也从一个贫困县乡下出生的小丫头，成长为一名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薇。回首之时，我深感自己的个人成长轨迹伴随着并完全得益于祖国的发展；而1987年到1994年，我在清华度过的7年难忘的时光（本科5年、硕士2年），则为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较高的起点。概况起来，我之得益于清华，主要有以下几点。

严谨勤奋、自强不息的学风

刚进清华时，我的压力巨大：高考后根据估分报志愿时，小城的中学校长要求我必须上清华，替我填报了计算机系，可我本人连计算机和计算器都分不清；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都是尖子中的尖子，个个成绩优异、智力超群，我的地区理科状元的高考成绩在班上30个人中只排名第20位；英语笔试成绩不错，可从来没有开口说过；班上6位女生中的5位都来自大城市，只有我一个人来自小县城，相形之下从穿戴到见识都很土气；就连说普通话，都担心别人听出我的河南口音。自卑之下，我只能奋起直追，勤奋学习、刻苦努力。本科5年，基本上所有的周六、大多数的周日我都是在自习室度过的。即使如此，很多同学还是常常让我自愧弗如：李继敏同学经常熄灯后还在楼道、水房学习；而那些看起来不甚刻苦的比如韩玫同学，则是因为聪明得让我望尘莫及。跟这样的同学们“比、学、赶、帮”，

互相砥砺，相互激发，我一丝一毫都不敢放松。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第一学期期末我的成绩就上升到班级第12名，第二学年第8名，后边两年一直稳定在前5名。前4年综合成绩我是全班第2名，得以免试直读研究生。硕士期间我也基本继续了勤奋努力的习惯，专注于功课和课题工作。随着成绩的取得，我的自信心也逐步增强，逐渐发现，虽然比不了聪明绝顶的“牛”人神速，但通过认真思考、仔细分析、讨论研究，很多难题我也能迎刃而解了。与这些聪慧优异的同学同窗为伍的经历将我的聪明才智激发到了最大的程度。同学情谊，山高水长，我将永远珍藏。

体育锻炼的传统

在清华园7年，自然少不了消沉沮丧的时候。我对付压力的方法，也是清华特色的一——强迫自己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跑步，挑战自己的极限，磨练坚忍不拔的意志。通过长跑，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还多次参加校运会女子3000米比赛，取得过业余组第3名的好成绩，为班级挣得了荣誉。校园喇叭里熟悉的号召“同学们，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至今仿佛仍在耳边回响。

注重外语学习

清华注重外语，师资、视听设备、教辅材料都是一流。很多同学们早早就

着手准备出国留学，学英语风气极盛。同宿舍的女生每晚人人听着英语磁带入睡。近朱者赤，我亦步亦趋的结果是英语口语突飞猛进，4、6级成绩都是优异。一开始我因为没有海外关系，加上家庭经济状况欠佳，并没有动出国的心思。后来看到似乎TOEFL、GRE成绩是唯一的门槛，好成绩就能拿到奖学金，投入产出效果很是不错，偏偏我等最不怕的就是标准化考试，于是我也在1993年考了托福、上着GRE班，准备靠自己的成绩敲开国际一流大学的大门。

一流的师长

人常说，成功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西谚又云：天助自助者。硕士阶段以后，我陆续遇到了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几位师长：张尧学老师、史美林老师、吴建平老师和方滨兴学长。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他们跟国内外学术和产业界的广泛联系还为我提供了人生中一系列的重要机遇和帮助。

张尧学老师现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为人仁慈面冷，工作勤奋过人，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虽然我的开题报告第一稿被张老师当着整个教研室老师同学斥为“对国内外动态掌握不够，需要在图书馆再查资料两周”，骂得我直哭，在他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下，最后我的硕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张老师当时刚从日本博士后回来，从日本产业界带来了科研项目和资金。早在1992年师从张老师时我就第一次走出了国门，见识了经济尚在强胜时期的日

本，跟业界技术最先进的公司开展科研合作，大大提高了我的眼界。

我的硕士导师史美林教授是70年代德国洪堡奖学金学者，跟德国Darmstadt理工大学的Erich Neuhold教授相识多年，保持着长期的合作交流。Neuhold教授1994年夏天到访清华，对张尧学老师领导下我们的课题水平大为赞赏，对我和其他同学表现出来的科研能力和英语水平印象深刻。当时他还兼任德国国家计算机技术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所所长，该所每年有固定经费必须用于聘请国外学者以利学术交流。访问后他主动提出希望接收我校硕士生到他的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史美林老师推荐了我，Neuhold教授当即同意，结果我在临近毕业之际意外得到了到德国留学的机会。1994年底到1997年初，我在德国Darmstadt做了2年多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候选人。这段时间我的学术成就非常有限，只以第四作者的身份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由此认清了自己并不热爱科研。相反，我的英语更加纯熟，德语进步神速，观察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细致敏锐，比对之下对中国有了很多的想法和建议，我发现自己在管理方面的兴趣。

吴建平老师是中国互联网的元老，他在不知不觉中就给了我一些帮助。90年代中期，我国电信事业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一直在国内从事电信行业的丈夫力劝我国内机会更多，希望我回国团聚。1997年我回国加入了当时仍归属邮电部的中国电信，负责在中国刚刚起

步的商业互联网服务业务。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商业运营经验，中国电信的网络管理跟起步更早的中国教育科研网差距很大。凭借国际化的眼光、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技术背景、熟悉互联网以及外语优势，我主动研究分析了大量的互联网技术和管理资料，给中国电信管理层提出了多项互联网业务合作战略、业务和网络管理制度的建议，并主动联系国外相关机构申请到了大量当时中国电信急需的互联网地址资源，邀请思科公司组织了全国的省级互联网管机构培训。短短一年时间众多的突出成绩引起了中国电信甚至原邮电部领导的重视。在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半数机关人员需要分流时，我被点名反向调入信息产业部，负责制定我国互联网的监管政策。后来信产部的副部长告诉我：“当初调你过来，除了你能力出众之外，还因为你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你们中国教育科研网的吴建平老师，中国互联网界的泰斗，经常批评我们邮电老朽不懂互联网新生事物。你来了，他以后就再不能这么说了。再说，就是他这个老师没把学生教好。”所幸我不辱师门，跟吴老师的合作也很愉快。我得感谢吴老师，他的学识风范和清华计算机系在中国教育科研网的辉煌成就无意之中让我得到了领导的额外重视，间接地助了我一臂之力。

我跟现为工程院院士的方滨兴学长的际遇更是巧合。1999年信产部根据我的建议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选中方老师



领衔这一项目。方老师到任后我们才发现，他在清华的硕士导师房家国教授正巧是我本科毕业课题的指导老师。我在信产部的工作跟方老师的部门直接对口，我们长期共事，配合默契。最终他的卓越才识和突出成就让我的业绩也随之增色许多。这样跟清华师友莫逆于心、肝胆相照、互相成就的合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兼容并包、厚德载物的气度胸襟

90年代后期，互联网在我国从无到有，飞速发展，日益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得须臾不可或缺。而我国的电信事业也经历着政企分开、引入竞争、加入世贸、对外开放等一系列调整。信产部1998年成立之初，要从无到有地建立我国的电信监管制度体系，大家都没有头绪。我试探地跟领导提出是否考虑借鉴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经验。信产部的领导开明、民主，当即给了我肯定的答复。初生牛犊不怕虎，拿到尚方宝剑，我主动利用互联网查阅外文资料，基于国外最新经验和中国具体国情，一口气起草了我国互联网新业务发展战略、互联网资源管理、互联网骨干网间互通、互联网安全监管等一系列分析和政策建议。我积极主动

的工作态度、出色的外语水平和高速的工作效率完全出乎当时信产部各级领导意料之外。拿出的情况分析有理有据，有借鉴有比较，提出的建议不仅跳出了政企不分的窠臼，而

且并不照搬西方现成，立刻引起了主要部领导的关注。多数我提出的建议文稿经领导同事讨论审阅、完善提高，最后都成为了信产部给国务院的政策建议。从1998年到2004年，我主导或参与了所有与我国互联网监管有关政策的制定。我的工作能力和成绩受到了信产部领导的充分肯定。2000年我被任命为电信管理局发展规划处副处长。2003年，担任网络和信息安全处处长，成为信产部最年轻的处长之一。

随着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包括地址和域名资源管理、网络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在内的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迫切需要国际间的磋商和协调。由于历史原因，互联网的监管一直由美国主导。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联合国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电信联盟是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其成员包括192个成员国和700多个部门成员及部门准成员。国际电联负责协调全球信息通信、制定技术标准与管理政策、推动ICT技术进步及在全球的普及，努力促使各方达成共识。2004年，经信息产业部选拔推荐，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80多位专家竞争，最终胜出，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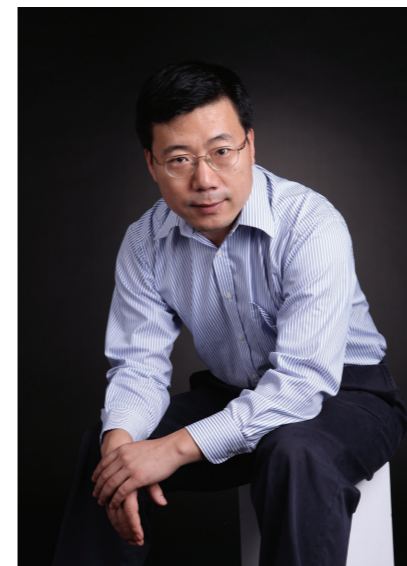
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局，负责研究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政策、体系和规则，并组织有关的国际磋商和协调。2010年初我被提升为国际电信标准化全会项目部主任，成为了享受外交礼遇的最高级别（P5）的联合国专业技术官员。

互联网治理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反映了当今国际秩序亟待变革的大课题。崛起的中国如何影响世界，是对我们这一代外交官新的挑战。如今在国际外交场合，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一方面，我们的观点、意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的变革要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来自既得利益方的阻力，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大国的影响力，必须包括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的能力和为全球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中国的外交必须高瞻远瞩，包容四海，提倡有利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公平公正的宏伟愿景，才能真正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的幸福。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外交官对国际间外交的各种组织、机制、规则有全面、深刻了解，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折冲樽俎的外交技巧，当仁不让，大胆创新。清华的校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奠定了清华人学贯中西的气度、放眼世界的胸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我也将以此自勉，在现在的国际外交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抚今追昔，再次感慨：清华时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清华的师友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将是我毕生的追求。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母校101岁华诞。📍

我们的时代

仇文彬（无72）



媒体这样形容我：仇文彬，1992届清华电子工程毕业生。宝尊电商创始人，CEO。喜欢穿Polo衫和卡其布裤；汽车的后备箱里一直放着一套高尔夫球杆；爱听罗大佑和陈奕迅；爱读希区柯克；有浓重的北方口音；手机是诺基亚，手提电脑是ThinkPad；热爱网购；最喜欢的品牌是Eddie Bauer。对于现在的我，还挺恰当。

在清华

1987年9月，我从山西长治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图像处理专业，开始了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五年大学生活。在学校，我觉得我是搬家搬的最多的人之一，从2号楼到26号楼，到17号楼，再搬回26号楼，好像每年都在搬。这种状况甚至延续到了我工作后的三年，感觉就是一直在漂，直到结婚之后才稳定下来。回头一看，大学几乎所有东西，一些文字、照片、同学录、笔记本、情书，几乎全都丢光了。我太太撇撇嘴说：“这不是理由，你从来就是个向前看，向前冲的人。不会回头看。”

在高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很拔尖的，但到了清华，才知道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这对绝大多数人的自信心，都是个打击。我想应该另辟蹊径，别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死拼，毕竟不是每个人有机会被邓爷爷摸过头啊。不过这个现在看起来不算打击的经历开始预示着：我总有办法敏锐地捕捉到自己感兴趣和预感能发展的地方，并坚持直到有所成就。

清华当时有很多自选课，我选了交响乐欣赏，朱汉诚老师的课，我想这个算是上帝给我打开的那扇窗了。上了朱老师的课，知道朱老师还是学校军乐队的指挥，我就顺藤摸瓜，成了军乐队的一名短号手。当时班里还有一个同学叫吕健，就瘦瘦高高那个，对，像麻杆那个，吹大号。我们两个出现的时候还是很滑稽的，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乐器的尺寸更是反差惊人。不过，我们穿上

制服，拿着乐器从宿舍出发去演出的时候，还是非常自豪的！

我的艺术老师是周乃森先生。早就听闻周先生为人率直，授课十分认真。他上课时，经常一人对几人手把手地教，亲身做示范，并且对于每一个音符，每一个节奏的指导都非常认真以及严谨。从周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作为一位清华的音乐教授，周先生所具备的是一种令人崇敬的一丝不苟的态度。周先生于2004年辞世，我现在依然怀念他。

我喜欢踢足球，大学参加了足球班。我的足球老师孙葆洁在1986年被誉为足球金哨，其后从2001年起连续很多年被评为甲A和中超联赛的最佳裁判。我很敬佩孙老师，他拥有正直的品格，他经常回忆他的学生时代生活艰苦，馒头蘸醋，就是一顿饭。在中国足球界，历经风雨，他坚守不变，实非易事。至今我还在很多场合提起他的风清傲骨，我的家人和同事也都很崇敬他。

如果说清华给了我什么，我觉得不是它的名头它的光环，而是它提供给你的这些和每个层面的精英楷模共处乃至受教的机会。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我记得在清华期间有次社会实践是一家公司帮忙卖乐器。那时正好是1989年国庆之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外面找事做。那家公司在清华南门外的牛街。当时面试我们的老板很年轻，大概也就20来岁，梳着个大背头。见面之初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问我们会不会弹琴唱歌。我们自豪地告诉他我们是清华艺术团的，对乐器还是很在行的。记